

艾
光
辉
著



走进刀郎

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乡村体验

一份关乎社情、民生的记忆档案

25天，在刀郎，在叶尔羌河畔的小村庄

艾
光
辉
著



走进刀郎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7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63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刀郎 / 艾光辉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619-4802-6

I. ①走… II. ①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6890 号

走进刀郎

ZOUJIN DAOLANG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3390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PRINTED IN CHINA

以叶尔羌河畔一个小村庄为视窗，
真实记录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
呈现一个你或许不完全了解的南疆。

——艾光辉

仔细阅读《走进刀郎》这部 20 多万字的日记体著作，如果说艾光辉用 8 个月的时间经过用心观察、凝神思考走进了“刀郎”，那么我作为一个读者也慢慢走进了艾光辉。

一个平时没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凭着一种承诺、一种责任，在 200 多天里，除了休假外竟然一天不落地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这本身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一般来说，写日记，很容易弄成流水账，但艾光辉没有，他用流畅的文笔把叶尔羌河畔的那座小村庄——尤勒滚鲁克村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他的笔下，“农业、农村、农民”已不再是笼统的概念和枯燥的数字，“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也不只是口号和社论，一个个人、一件件事都鲜活地跃然纸上。一次次入户、一场场访谈，都在诠释着每年 7 万、三年 20 万人驻村这一决策的现实作用及其深远影响。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描述所见、所闻、所历上，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所感、所思。翻开书稿，思想的火花随处闪烁，真知灼见时时流于笔端。如：对南疆耕地、地下水资源的匮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题的忧虑；对新疆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社会”出现的“日益保守化趋势”的担心；尖锐指出“教育落后是贫困的根源，是极端主义思潮蔓延的温床”；大声疾呼教育的终极目的“并不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是人格的健全发育与培养”；面对异端邪说，提出“我们不能仅仅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角度去批驳，还要善于正本清源，用《古兰经》的本意去驳斥”的独到见解；针对非法宗教活动，发表“在与非法宗教组织和人员的斗争中，

宗教界的作用可能远大于政府的作用”的实话实说；指出村民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群众维护稳定的主动性、能动性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这些，都是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心凝神思考后提出的带普遍性的新疆社会现实问题。

《走进刀郎》，一段不平常的身之历、心之旅，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由此联想，7万人、20万人，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艾光辉这样去观察、去思考，但至少各驻村工作组的领队应该如此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

张贵亭

2014年11月9日

自序

时间流逝的速度永远是恒定的，本无快慢之分。可是，在人们的感觉上，有时度日如年，有时却光阴似箭。通常情形下，眺望未来，我们大都会感到时光漫长；而回首往事，我们却会感到时光飞逝。这正是我此刻的心境。在回首驻村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时间的步履是那么匆忙，200多个日日夜夜已经静静地存入记忆的档案盒里。

想当初，校长征询我的意见：可否第一批下基层驻村工作？我听了心头一震，然后是一片茫然。我知道，根据学校的现实状况，在谁下去的问题上并无多大选择空间。再说，既然都要下去，晚下不如早下。按照钱钟书的“吃葡萄理论”，我历来属于那种先吃“坏葡萄”的悲观派。

一连几天，心好像都在空中悬着。将要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如何？生活方式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何应对？下去究竟要做什么？本来正在做或计划要做的工作如何安排？……越想问题越多，越感到迷茫。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一点，就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驻地。

出发那天，学校在主楼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送行仪式。现场弥漫着一种在后来看来有点儿滑稽的悲壮气氛，那又是一个冬末的清冷的早晨，有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无论什么事情，当它一旦变为现实，你忐忑的心情就会转化为踏实感。当我们住进村里，收拾好满是尘土的简陋小屋，生起小煤炉，我们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确定性变得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既然已迈出第一步，跟着就必须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并且不停地走下去。

客观地说，乡村各方面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县、乡干部的从容和村干部的朴实，给了我们最初的信心和慰藉。

对于“三民”（后来改简称为“访惠聚”）工作，我的理解是：“访民情”是基础，“惠民生”是关键，“聚民心”是目的。上级党委的关注点在“聚”，老百姓的聚焦点在“惠”，而工作组的切入点却是“访”。一开始入户走访，工作组每个成员的忧国忧民意识就都被激发出来了，驻村工作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走进一户户农家，我们看到了发展，也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希望，也发现了危机。我们为百姓生活一天天的改善而欣慰，也为这种改善的基础薄弱而忧虑。我在接受人民网和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都说过一句相同的话：驻村以来，我们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感受，每天都有新思考。身处中国最西部、最基层的乡村，在农民的屋里院外，在广阔的田间地头，在与村干部每一次握手的瞬间，在轻松坦诚的座谈交流会上，我们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充沛温热的大地气息。

初到麦盖提，我意识到自己暂时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与农民朝夕相处，必将成为人生旅途中独特的经历与体验。同时，这也是一个契机，这么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南疆农村社会，或许我能够得到许多在书斋中、文献里得不到的启示，并激发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因此，我觉得应该记录下这段岁月，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于是，一向没有写日记习惯的我，从3月4日起开始写“驻村日记”，并立下宏愿：最终出版一本日记体著作。最初拟定的书名为《走近刀郎》。那时我觉得，用一年时间能够尽可能接近刀郎历史文化、接近基层干部群众的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已属难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见闻的积累，随着与干部群众交往的深入，随着思考的深化，自信心也在潜滋暗长，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把书名改为《走进刀郎》。至于走进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离“最后一公里”还有不短的距离。

于是，每天的写作成了一个承诺，它督促我每天都要用心去观察，凝神去思考。每天做完必做的工作后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时光，是我一天中最充实、最惬意的时刻。老实说，《走进刀郎》的写作，是我驻村一年重

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它使我对时间的态度变得矛盾起来。有时我盼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儿，我的家庭、学生、事业，每时每刻都在远方召唤着我；有时我又担心驻村工作会因某种原因戛然而止，我不想在农村的工作半途而废，更不想我的写作计划中途夭折。

乡村生活不同于都市，它不那么程式化、规范化，而是更加放松、随意。乡村生活的特点，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在本书写作中，我力求去学术化，力避文学腔，努力突出纪实性、随想性。当然，现在回头检视，这一目标也许只是部分实现了。

驻村生活已近尾声，很快我将回到已见证我大半人生的、我热爱的学校生活轨道中。我想，到了离别之际，我不会有太多的不舍与伤感。但是我知道，尤勒滚鲁克村——那个叶尔羌河畔的小村庄，将永远在我心中留下清晰而鲜活的记忆。驻村一年，我们有过艰苦的体验——骄阳下沙上植树，风沙中走村入户；也有过惬意的感受——坐看风起云舒，卧听鸟喧虫鸣；有过沉重郁闷的时刻——在一贫如洗的农户家中，在倾听村民申诉之际；也有过欢欣快乐的时光——在村民喜庆的婚礼上，在老友新朋欢聚的谈笑中。我们每天都有对现实的忧虑，每天也都有对未来的憧憬。时间虽在流逝，但记忆必将历久弥新。

艾光辉

2014年12月1日

目 录

序 /1

自 序 /3

第一章 春动的三月 /1

第二章 希望的四月 /41

第三章 勃发的五月 /87

第四章 浓绿的六月 /115

第五章 火红的七月 /149

第六章 甜蜜的八月 /179

第七章 丰盈的九月 /229

第八章 欢愉的十月 /283

后 记 /327

第一章

春动的三月

大约在2004年之前，“刀郎”这个名词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即使生活在新疆的人也未必能够明了。然而，2004年，一个来自四川、艺名叫“刀郎”的歌手，凭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几首充满浓郁新疆情调的歌曲，使“刀郎”这个名词在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刀郎”其实还是一个古老部族的名称，它是今天维吾尔族的一支，主要生活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叶尔羌河流域。“刀郎”一词出现在察合台汗国时期（13—17世纪），最初的意思是“集中”。刀郎人不仅勇敢彪悍，而且颇具艺术基因——刀郎舞和刀郎农民画闻名遐迩。近几年来，来到新疆的游客几乎在任何一个附带表演的餐厅都能欣赏到大气磅礴、激情四射、奔放铿锵的刀郎舞蹈。我曾经在一个剧场看到，舞台上跳刀郎舞的演员在跺脚时居然把皮靴震裂了。

我这次驻村的地方——麦盖提县就是历史上刀郎人生活的核心区域之一。其实，我与麦盖提结缘并非始于今日。在我两岁时，曾在此短暂居住，可惜幼年的记忆早已像清晨的薄雾般消散得无影无踪。

2014年3月4—5日

3月4日是出发的日子。早8点50分即来到学校，参加简短的出征仪式。上车前与同事们一一握手道别，从人们的话语间和眼神里，不难体味到种种复杂的情感。

由于行李较多，而且需要带车下去，我们选择了驱车前往的方案。自1998年之后，我再没有连续乘坐汽车1000公里以上的经历。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车子几乎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因此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些年公路建设的巨大成就。回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坐汽车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少则四五天，多则六七天，我所经历的最长一次居然有9天时间。那时，柏油路都很少，大多是碎石路，汽车行驶在上面，不仅尘土飞扬，而且颠簸得人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可是，这一次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只用了一天半时间，路好，车也好，连续坐车五六个小时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

从阿克苏经巴楚到麦盖提的道路则要差一些，但可以看到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今天的中国，虽然问题仍然存在，但大多数问题——尤其是建设方面的问题，都能看到解决希望，而且是并不太遥远的希望。这就是人们尽管抱怨但仍然对未来保持信心的原因。

5日下午6时许，抵达目的地——麦盖提县。县城面貌超乎我的想象：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人气颇旺；街面整洁，秩序井然，与沿途某些县市的混乱无序形成鲜明对照。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一路穿城而过，居然没有见到一个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后来，我从当地干部那里了解到一个情况——此地大众文化活动较为活跃。这使我得到一个启示：但凡大众文化较活跃的地区，宗教气氛通常不会太浓厚，极端主义也难有很大的滋生空间。因为宗教总是要抑制人们形而下的欲望，而大众文化总是释放人们形而下的欲望。因此，要挤压极端主义滋生的空间，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政治说教，也不是行政干预，而是大力培育、积极支持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

在县委招待所，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县委常委阿不力克木同志，一位英俊而精干的年轻干部。他陪同我们察看了即将入驻的村庄，与部分乡、村干部见了面。

2014年3月6日

今天，正式入驻巴扎结米乡尤勒滚鲁克（“红柳”之意）村。

巴扎结米乡位于麦盖提县城乡接合部，设立于1950年。乡政府驻地距县城东南3公里，设在尤勒滚鲁克村，其地理坐标为东经77度60分至77度

76分，北纬38度87分至38度93分。巴扎结米乡东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前进水库；南以提孜那甫河为界，与尕孜库勒乡、库木库萨尔乡为邻；西以叶尔羌河为界，与希依提墩乡相望；北接央塔克乡、昂格特勒克乡。总面积7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3万亩，林地4.2万亩，荒地0.92万亩，公共积累田0.95万亩。乡政府提供的材料中介绍，2013年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6435元，乡集体经济收入271万元。该乡下辖15个村委会，53个村民小组。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乡共有5567户，22369人；其中，维吾尔族占86.45%，汉族占13.17%，回族占0.22%，其他民族占0.16%；农业户4712户、19806人，非农业户855户、2563人；低保户2096户、4793人，农村“四老”人员113人。共有乡机关干部43人，村“两委”班子成员106人；乡、村干部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3人。全乡共设26个党组织，党员总数701人。全乡共有村警15人，协警49人，联防队员98人，十户长340人。共有清真寺53座，宗教人士53人。

从麦盖提县城到尤勒滚鲁克村，都是平坦的柏油路。村委会建筑是一排有30年历史的已显陈旧的平房，带有极具新疆民居风格的前廊。走进村委会大院，正前方是一个大大的葡萄架，两侧种植着一些果树，右侧是新建的村文化站和一个篮球场，院内还拴着一条狼狗。

村委会给我们腾出了四间房，三间做宿舍，一间做厨房。宿舍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柜、两沙发，均已十分破旧。但由于我来之前对此地生活条件的预期是接近生存的底线，因此呈现在眼前的生活设施，让我感到些许欣慰。

显然基层的准备工作与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电视与网络未通，没有洗澡设施，防护网与防盗门也未安装，厕所是简陋的旱厕。整体生活条件与大城市相比，至少有50年以上的差距。可见，要把城乡一体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并非易事。身居陋室之中，我忽然感觉时光似乎可以倒流，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生活环境中，只是那时在简单乡村生活中的乐趣与安适，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2014年3月7日

从昨天到今天，陆续添置了一些必备的生活设施：宿舍里添置了电视机、

小凳、脸盆、折叠式布衣柜，厨房里添置了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抽油烟机、餐桌等。大家顿时感到生活品质有所提升。浴室、卫生间和专用厨房，正在院内建设。乡干部说：3天就能建成。我听后愕然，心想“新疆效率”莫非在乡村中体现得这么明显？他们倒是说干就干，当天就动工了。不过通过两天的观察，我断定两三天完工是不可能的。

这两天见得最多的村干部就是村支书吐尔逊·阿吾提。我们了解到，村委会几个干部和三个清真寺的伊玛目，都是吐尔逊家族成员，这使得村里党政之间、政教之间关系较为和谐，避免了很多矛盾与冲突。从现代分权政治理论来看，各种权力应相互制衡，在同一个组织中，有血缘关系的人应该相互回避。但是，在尤勒滚鲁克村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维吾尔族村庄，传统社会的某些治理方式仍然具有现实价值。你可以说这是人治，但它确实有效。当然，其前提是要把人选好，选出的人既要人品好又要有能力。人们都说：制度比人重要。从长远和根本上讲这无疑是对的，但在某些特殊背景下、特定环境中，人可能比制度重要。归根结底，社会治理方式要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长期以来，许多人热衷于照搬西方体制机制，从理论到理论设计中国社会改革蓝图。它看上去可能很美，却未必能够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根开花。

尤勒滚鲁克村现有人口 1047 人，其中男性 519 人、女性 528 人。中国整体上是男多女少，而这个维吾尔族村庄却正相反。村里现有劳动力 580 人。土地方面，有 30 年承包地 2300 余亩，荒地 620 亩，公共积累田 430 亩，这些土地是村里重要的经济来源。该村主要农作物为小麦、棉花、核桃、红枣。全村有村干部 7 人，党员 46 人，团员 65 人，宗教人士 3 人。在麦盖提县，这是一个中等偏小的村子。2013 年人均纯收入 6440.71 元，计划到 2020 年达到 15881.73 元。一个南疆村庄的人均收入发展规划竟然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难道还不能让所有经济学家汗颜吗？当然，这也可视为关于形式主义的幽默。

2014 年 3 月 8 日

驻村生活的一大麻烦是生火炉。早晨起来，先要把昨夜炉中的煤灰清除。用火钩一捅，煤灰霍地腾起，床上、桌上很快就蒙上一层灰尘。铁炉热得快，

一烧起来，屋内的寒气顿时被驱逐殆尽；缺点是温度不好控制，也许是我的经验不足，没有掌握控制温度的技巧。

中午，一个柯尔克孜族校友来访。他2007年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后文简称“塔县”）工作，现已当镇长。他英俊挺拔，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说会道，言谈举止之间透露出精明、干练和圆通。他一方面表现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建设家乡的自信与豪情，另一方面又不无抱怨地说：现在惠农政策太多了，从医疗、教育、住房到农牧业生产资料和文化消费等许多方面都有政府补贴，个别群众有点儿被惯坏了，得了补贴还不知足，甚至得寸进尺，提出自来水费为什么不补贴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他还说到自己的一个执政感悟：对不同的群众要用不同的管理方法。

这个基层行政干部的一席话使我想到了：理论总是骨感的，而现实却是丰满的。从理论上、道义上讲，国家发展了，理应回馈农村、农民，毕竟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农民做出的牺牲最大；而且适时把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农民，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但是，惠农政策如何设计，怎样把握出台的节奏和力度，尤其是怎样把惠农政策与提高农民的现代意识、现代技能及竞争精神结合起来，可能才是一篇真正的大文章。如果把惠农政策仅仅简化为给农民实惠，其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至于农村基层治理，更是万分复杂的社会课题。如果以为只要懂得“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宏大的概念，就能有效地执政一方，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人们把“群众”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使用的时候，很容易把“群众”理想化，把它想象成一个均质的群体。实际上，群众的区域差异、人与人的个体差异极大。古人在讲载舟覆舟的道理时，把老百姓比作“水”，从此以“水”喻民成为经典论述。但不同流域、不同地方、不同时节的水质并不相同。我想，当我们指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时候，是否本身已经走在简单粗暴的歧途？

2014年3月9日

今天是我在乡村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早饭后察看巴扎。对南疆地区的

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巴扎”并不完全等同于农贸市场，它不仅是一个商品交易场所，也是一个人际交流空间，还是一个消遣休闲之地。

我们去得稍早了点儿，巴扎上人头攒动、尘土飞扬、人声嘈杂的高潮时刻尚未到来，但各摊位大都已准备就绪。如今的巴扎与我童年印象中的自由散漫的巴扎已迥然不同，所有摊位全部在一个大场院里，政府统一修建了交易大棚，并划分出五金区、小商品区、食品区、服装区、杂货区等许多区域，既方便群众购物，也方便政府管理。但在突出了商品交易功能的同时，巴扎的其他传统功能似乎被忽视和弱化了，传统巴扎的那种乡土气息、民间色彩也好像有所淡化。这些年什么都讲规范管理，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也是现代社会的刻板与乏味之处。

在巴扎上，我买了一把火钳、一个煤铲，还买了几个小碟和一点儿干果。除羊肉外，各种商品都较便宜，比如盛菜用的玻璃小碟，一个只要1元钱。但我进一步了解后得知，每个小碟进货价是8角钱，商贩挣2角，销售利润率20%，已经很高了。

下午，麦盖提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马军喜来访。他介绍了当地社会治安情况。我发现当地干部对本地治安状况的评估并不像我们之前听说的那么乐观。他说：南疆地区反分裂斗争最复杂的地带是叶尔羌河流域和兵地接合部。兵地接合部由于兵地管理上的分治和衔接问题，容易形成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给分裂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但从逻辑上讲，兵地接合部未必是分裂主义的主要病灶所在，叶尔羌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恐怕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分裂主义的根源必须从历史、文化、经济等层面去探寻。

2014年3月10日

今天是阴天，风有点儿大，穿着羽绒服走在外面还觉得冷飕飕的。

在村支书的陪同下，我们察看了尤勒滚鲁克村一小队。该小队共有80余户人家，房屋都建在乡村公路两旁。尽管政府实施了“富民安居”工程，按每户2.8万元的标准提供补助，帮农民建设富民安居房，但我们看到，大多数农户居住的仍然是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过的土坯房，仍然是简陋的围墙和院门。难道农民不知道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吗？当然不是。据了解，在这

里建一所 100 平方米的房子，大约需 15 万元，对一些并不富裕的村民而言，政府的补助对他们建房压力的减轻幅度太小，不足以转化为他们建房的动力。一路走去，我们也看到几户人家正在盖新房。村支书说：今年计划建 40 套新房，照此速度，全村居民全部住上新房大约需六七年。在一小队，我们见到三四处乡村“华屋”，其主人不是村干部，就是在外经商的人家。

乡政府在一小队区域。乡党委、政府、派出所、卫生院、双语幼儿园等都是近年新建的现代化建筑，在破败的民居映衬下，显得格外新潮光鲜。尤其是乡政府大楼，门前还有一个不小的广场，停放着许多汽车。

小张是乡里派来在村里蹲点的干部，也是驻村工作组的联络员，性格豪爽，热情开朗，但工作的条理性和严谨性稍差。网络一直未通，小张一会儿说要铺设网线，一会儿又说用无线网卡。这两天未见小张的面，今天他来了，我问他网络的事，方才得知铺设网线做不到，只能买无线网卡；又问电视的事，他说找人来弄，看来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2014 年 3 月 11 日

这几天与村党支部吐尔逊书记接触较频繁，而对其他村干部还较陌生。所以，今天我们约请全体村干部座谈，进一步了解村子情况，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寻找切入点和抓手。

通过座谈，我深深感到新疆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尤勒滚鲁克村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出过的大学生不足 10 人。目前，在内地新疆高中班上学的有 2 人，在疆内初中班读书的有 1 人。去年，村里小学毕业生 17 人，初中毕业生 28 人，只有 3 人上了高中。我很好奇：为什么上高中的这么少？因为我知道在南疆地区高中教育也是免费的，学生的学费、教科书费、住宿费全免，每月还给学生发放生活补助。我得到的答案是：学生们由于基础太差，没有继续念高中的信心。这里的双语幼儿园硬件设施已经很好，但师资匮乏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据说大专生都很难招到。村里的会计是初中文化程度，去年上面拨下一笔 68 万元的专项经费，可是村里的会计既不知道来自哪里、干什么用，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由于教育落后，这里的群众普遍对教育缺乏热情。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双